《余英时集外文》编后记

（一）

终于弄好了这个山寨版《余英时集外文》（五卷）。从 1 月份收集资料算起，倏忽半年，过几日我也将结束大学生活。四年里我的生活是跟阅读联系在一起的，可能以后都没有这样的时光了。原本并无打算整理出这份东西，只是有感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十卷《余英时文集》未收入由于语境问题的相关作品，觉得是一件挺遗憾的事，直到我开始有心收集，也还是纯粹自娱自乐，后来资料稍多，忽生念头：既然收集的资料已可观，何不整理出个《余英时集外文》呢？

这样定下来后，每天一有闲空，就 google、百度，在各个网站乱钻乱窜，见到余英时的作品（文章）及关于他的相关新闻就收入囊中。这种激情就像收废品的一样，请诸位原谅我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联系在一起，实在是临近毕业，那些收废品的人乐开了花，生意好得不得了，“来，来，来”，“行，行，行”，只要是废纸废书啥的，一样也不能让你溜掉。跟收废品的需要对废品进行分类处理，我也需要对收集的一堆芜杂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，剔除一些东西，否则它们便形同一堆“废品”。

当我真正开始整理时，才发现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。简而言之，收集资料还算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，而分类整理就他妈一件累活。在这中间我多次自言自语，还好整理的只是山寨版的，如果是 CCTV 版的，那还不累死人？由此我更加体会到今日大陆之编辑混口饭可不容易。其它的，就不在此大倒“苦水”了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累并快乐着。原本想埋头苦干个几天，在 6 月 4 日这一天彻底整理好传上来，后来又觉得有些别扭和无趣，该怎么样的节奏就怎么样的节奏，纪念不一定非要搞成某种特意形式，更没有必要借此谩骂，有一分证据，说十分话。纪念可以是一个人的事，心里有数，化作一种内在的力量，每一天都是纪念日。

现在整理出的“集外文”，计有专著、序言（自序与他序）、时论、访谈录等几大块内容，总计 60 余万字，大概百分之三十（专著居多）已收录广师大出版的十卷《余英时文集》。原本想放弃专著这一块，只收录广师大版未收入的内容，但最后还是决定收入。若以此论，我整理的集外文有些名不副实的，套上个“山寨版”就保险多了。这几大块内容，具体分为以下五大部分——

第一部分，在略述余英时及其著作目录的基础上，收入关于民族主义与共产党、毛泽东等几篇文章，总计近 9 万字。关于毛泽东，余英时曾写有三篇专文《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》（收入《史学与传统》一书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初版，1982）《打天下的光棍》《在病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》（原载《中国时报》，后有收入《反叛的御医》一书）。我只从网络上搜索到《打天下的光棍》，其余两篇，我已将台版《史学与传统》上传到新浪爱问知识人中的“共享资料”，有兴趣者可去下载，无需注册与积分，因文件稍大，可能下载所需时间较长；对《在病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》一文有兴趣者，只能想办法找纸质版阅读了。

第二部分，收入余英时为友人作品所作之序，总计 12 万字。2008 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余英时的《会友集》，此书收集了他近二三十年来为友人著作所写的序文，其中大部分收入此山寨版《会友集》，另外几篇无法从网络搜索到，待他日有机会再补充进去。

第三部分，收入余英时相关作品的自序及怀故人之作，计有 7 万余字。如收入他为《顾颉刚日记》（联经出版社）所作长文《未尽的才情—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》 的引言部分。

第四部分，收入余英时的时论（政论）及采访录，计有 40 余篇，76000 余字。这一部分文字主要搜索自《自由亚洲电台》等电台或报刊。

第五部分，收入余之专著、友人对谈及采访录等，计 23 万字。其中，专著部分均已收入广师大版十卷文集中，《学术何以必须自由》及与友人刘梦溪的对谈《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》，有收入于 2008 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《明报大家大讲堂》。2006 年，余英时获得“克鲁格奖”，在此集中收入他领奖时的演讲《当中国文化回归主流之“道” 中西对抗将终结 》与相关访谈。最后，以余杰《我在哪里，哪里就是中国-侧记余英時》作结尾，附录个人的“编后记”。

（二）

香港

余英时对香港一直有感情，50 年代当学生的时候，他跑遍大街小巷，虽然开始时不习惯，很想回去，待久了，发觉真的自由，无拘无束 。晚年他回忆：“要不是在香港成长，我没有今天这种自由想法，如果在共产党或国民党教育下长大，一定会受限制，有些东西不能想，根本不敢去想。”他希望香港不要把这个好传统丢掉。

由无疆界记者组织的《全球年度新闻自由指数》可知，香港近几年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每况愈下。其中，中共势力的渗入是主要原因。比如 2003 年，因中共插手香港事务，修改《香港基本法》第 23 条，加入叛国罪、分裂国家行为、煽动叛乱罪、颠覆国家罪及窃取国家机密等多项条文。又如，有人批评凤凰卫视变成了 CCTV。另外一方面，钱摇醒整个中国大陆，香港有一半的媒体在大陆都有经济利益，“对于那些前往大陆采访的香港记者来说，在与地方官员以及权势部门打交道时必须小心，因为他们根本不喜欢我们香港媒体的风格。整体来说，关于大陆的报道都比以前要保守”（香港记者协会一负责人）。

对此，余英时不无忧虑，认为现在香港言论说话的人，慢慢自我控制，开始一个自我洗脑的过程，“你要迎合大势力，怕得罪它，怕自己的利益受损，那就会越来越限制自己，不用别人给你洗脑，自己自我洗脑”，“如果我这句话对香港人有意义，这句话我是要说的”。

故国

1978 年，整个中国都被文化大革命所破坏，余英时在这时被邀请率领美国的汉代研究代表团到大陆考察，这个旅程带给他很大的感触：“不能想象那样的社会，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会，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，只有计算，到处是政治挂帅，所以我觉得中国比任何一个外国，对我来说都还要外国一点，所以我不感觉那是回到中国。”他回来之后精神有几个月不振，觉得他认识的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，从那以后，“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，我的故国已经成为记忆了，只能在记忆里面”。

Thomas Mann 在美国流亡的时候，人家问他想不想德国，他说当然想念。人家问他怎么办，他说没关系，我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德国。余英时引用了这个故事，道出他对“故国”感觉大概也是这样，“我在哪里，哪里就是中国，为什么要到某一块土地才叫中国？那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”。

类似的“故国”情感，他在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》中有一段论述：个人能不能向民族或国家认同，分析到最后，还得看他对这一集合体能不能发生出乎内心的归属感。他引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位法国宗教领袖的话说：“祖国并不是我们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一块土地，真正的祖国是一个政治社会，在这个社会里，所有的公民都受同样的法律保护，也都为同样的利益而维系在一起；他们享有人的自然权利，并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。”

尊严

1952 年，他新亚书院毕业后即想赴美求学，但当时国民党与美国有协定，任何人从香港到美国必须持中华民国护照。余英时在香港提倡民主自由，是个自由派的人，当时的国民党无法容忍，认为这是在搞“第三势力”，拒绝给他护照，到美国连护照都没有，拿的是替代护照的宣誓言—无国籍人士的临时证书。《历史与思想》刚出版的时候，国民党想把它禁掉，因为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批判力量。

中共“六四”清场后，他多次撰文谴责中共，并誓言决不回国，不与共产党有任何层面的接触（中共曾对他多次抛出绣球）。香港回归后，他连香港也不去了，因为他绝对不去“共产党所统治的任何地方”。网络上多以“反共”形容他的政治立场，这个词汇本身太模糊。“反共”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以革命方式推翻共产党；“批共”则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，反对暴力，讲究“妥协”，达到“党天下”的解体。余英时不同意过度激进的变革，批判保守的威权，代表的是一种温和的、渐进的声音。

2009.6.10